

Hedin)发现楼兰的时候,27岁的安特生正经历着一个令人沮丧的探险之旅。当时,他以瑞典南极考察团团长的身份,带领团队到达了南极大陆。但令人遗憾的是,考察团所带物资不足以抵抗南极的严寒。安特生只得草草收场,回到瑞典。

1902年,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,之后拿到该校教职,还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。中国辛亥革命以后,民国初年,安特生接到了来自遥远东方的邀请。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提议,邀请安特生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。接到聘书的安特生,作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——奔赴中国。安特生的路线是——由欧洲到印度,从印度经过千里辗转,从新疆进入中国。

1914年4月,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,安特生乘坐一叶小舟,在河水暗蓝的塔里木河里缓缓而行。他的手中是一本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(A. Herrmann)的著作《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》。这本书,在当时的欧洲一时轰动。自德国地理学家、地质学家李希霍芬(Ferdinand Richthofen)于19世纪中后期写下《中国——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》,首创“丝绸之路”概念以后,中国成为欧美许多与考古、人类学以及地质学相关的人所热衷之地。然而,无论在李希霍芬之前还是之后,这些来到中国的“探索者”在发掘中国古代文化之际,也在对之进行着空前破坏——敦煌、龙门、云冈的石窟壁画、古代石雕像,洛阳的古墓无不经历劫难。

民国初立,生于1887年的江苏



当他在刘长山带领下,来到澠池,在仰韶村捡起彩陶片的时候,实际上捡起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。



泰兴学子丁文江,已经负笈日本后又留学英国归来。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学位的他,先是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了一年书,然后就北上京城,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,继而与章鸿钊等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。身为“海归”,丁文江得到两点他自己的认识——其一,中国要富强,必须要振兴工业,要振兴工业,必须要寻找更多矿藏;其二,遍览欧美,当时的瑞典算是一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。由此,丁文江建议农商部聘请安特生为顾问。

可到了1914年5月,当安特生从新疆辗转抵达北京的时候,丁文江却已经跑到云南去做田野调查了。一开始没见着丁文江的安特生,倒也干劲十足——当年,他就发现了一处铁矿。1916年获得续聘后,又于1917年在河南西部地区发现了一些古生物标本。1918年,安特生不仅在河北宣化又找到一处铁矿,还

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发现了一些禽类化石。到了1921年早春,安特生甚至与亦来到中国的时年27岁的奥地利古生物学者奥托·师丹斯基(Otto Zdansky)一起,在周口店有了新的发现。“我有一种预感,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。”安特生当时对师丹斯基说,“如果有必要的话,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。”可紧接着,安特生却离开周口店,南下河南。

那里,是安特生自1918年就曾涉足之地——河南新安县传教士马丽亚·佩特松曾经带安特生到澠池县北部,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化石。安特生返回北京之际,留下了助手、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在河南继续探寻。1920年冬,刘长山给安特生看他带回的600余件陶片和石斧、石刀,并告诉安特生,这些东西,都是从仰韶村买来的。此时的安特生不仅在研究周口店的动物化石,也发表了一篇《有关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》的短文。他亦注意到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发掘出石斧。因此,对刘长山带回北京的石斧特别感兴趣。这也成了他暂别周口店,南下河南的原因。

当他在刘长山带领下,来到澠池,在仰韶村捡起彩陶片的时候,实际上捡起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。因为安特生是作为当时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在工作,同时他带

下图:安特生及其助手1924年6月发掘齐家坪遗址。

